

# 英雄的悲剧

——浅议吴虞坎坷的一生

彭超<sup>1</sup>, 彭燕<sup>2</sup>

(1.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2.四川大学 古籍所,四川 成都 610064,《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本论文通过分析吴虞几起几落的人生经历,透析在新文化发生期间,儒家思想的潮涨潮落。吴虞一生致力于批儒反孔。对于儒家的批判使得他成为新文化阵营的急先锋,成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但是这种思想也使得他在自己的故乡成都几次被驱逐。当他在被新文化阵营抛弃后,落寞地度过一生。

**【关键词】**批儒反孔;英雄;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3-0105-04

讲述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那段历史,吴虞是一位不可疏漏的人物。吴虞,1872年出生于四川新繁。他是成都较早提倡新学的人。吴虞不顾周围人的嘲笑,四处收集有关新文化的书籍,十年如一日。他1905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五四”时期,在思想界,他与陈独秀南北遥相呼应。他曾盛极一时,在全国颇具影响力。但是,时代的浪潮将他推向顶峰的同时又将他摔下谷底。吴虞这位传奇性的人物,被陈独秀称为“蜀中名宿”,被胡适评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但又屡次被成都教育界驱除。他一度成为思想革命的标杆,又一度成为新文化的反面人物,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的一生与反儒排孔紧密相依。新文化运动成就他人生辉煌的一页,也给予他落寞的一生。

## 一 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

中国新文化运动,首先是新思潮运动。在这股新思潮运动中,核心口号是“民主”、“科学”。要实现“民主”、“科学”,首先必须同传统的封建礼教斗争。传统封建礼教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以孔子为教主,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中国几千年以来,封建宗法社会得以维持,关键是封建家族的伦理道德。吴虞处于中国新旧文化斗争最为激烈的时代。他自身的家庭悲剧使得他对于封建家庭伦理产生强烈的叛逆心理。成都,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城市,它更容易容纳凝固不变的思维模式。在这样的城市,个体的叛逆行为容易遭受群体的驱逐。吴虞因为批判儒家学说,反对尊孔复古的逆流,被驱逐出成都教育界,并受到当时清政府的逮捕。成为在逃犯的他,在辛亥革命

之后重获自由。但之后不久,他又成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命运多舛的他,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坚信民主、自由。“五四”时期的他,盛极一时。他批判儒家的学说,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强音。盛名之下,他被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选学他课的学生数量之多,在当时的北大可谓盛况空前、空前绝后。

“五四”时期,在北京的陈独秀、胡适提倡新文化运动。胡适倡导白话文学。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鼓吹“民主”“自由”。然而,他们吹响了号角,却没有能够找到具体可以攻击的靶子。在思想界,吴虞的出现正如胡适之于白话运动。吴虞的思想为冲锋呐喊的新文化战士们提供了找寻的目标——对儒教的批判。或许,正如古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言,吴虞在成都的失败,使得他在北京开拓了又一份新天地。1921年,吴虞被北京大学聘为国学系教授。他先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学院任教。1921年,他的《吴虞文录》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亲自为之作序。胡适在该书的序言中称吴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打孔家店”口号响彻全国。这个口号的源头出处便是胡适对吴虞的称谓。不同之处在于“打”与“打倒”,反映了反孔思想在以后的日趋激进。

吴虞首先肯定孔子在其自身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人。但是,他接着指出一种思想在千年以后还被推崇信奉,是不应当的。因为时代在变,思想也在变。如果将千年以前的思想奉为当今的行为准则,带来的只能是落后、腐朽。中国,这个昔日辉煌的泱泱大国,现在正处于贫弱、衰败的境地。她就像一个迈不动步伐的老人,奄奄一息。吴虞在给陈独秀的

收稿日期:2010-06-08

作者简介:彭超(1976-),女,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信中提及自己攻击儒教的原因。“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sup>[1]p385</sup> 吴虞于1915年写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是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还处于宗法社会中不能与世前进,根源在于家族制度。吴虞借庄子的口,指出所谓孝弟不过是世人用以保持禄位的工具而已,指出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sup>[2]p65</sup> 吴虞还在文中借明朝李卓吾之口,指出上千年以来儒家思想垄断中国思想界,导致是非的泯灭。“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sup>[1]p65</sup>

吴虞揭露了儒家之所以会延续千年的原因是因为历代的帝王需要借儒教巩固自己的地位。“由此观之,儒教不藉君主之力,则其道不行。故于信教自由之国家,而必争孔教于宪法;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sup>[1]p146</sup> 吴虞进而指出,现在社会上弥漫的复古尊孔的思想,是盗跖之徒像利用孔子的思想达到维护封建君主制的目的。吴虞反对儒家思想,从其核心批判,即,批判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吴虞于1917年写《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驳议》中,揭露儒家与君王相互利用的真实面目。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霸主民贼,既利用经传,盗窃圣知,以遂其私,而钳制天下。而儒者亦利用霸主民贼之力,以扩张其势而行其学。二者盖交相为用。”<sup>[1]p146</sup> 于同年的论文《礼论》中,吴虞更是指出,儒家制定的礼仪规范,不过是替制造听话的顺民,巩固帝王的统治吧了。“是故福泽谕吉之论吾国曰: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者,所以调和民间郁勃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也。”<sup>[1]p135</sup> 正因为如此,在两千年的礼乐熏陶之中,中国人被培养得奴性十足。

鲁迅在文学上为文坛提供了颠覆性的作品,即《狂人日记》。吴虞关于《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的出世,无意成为与《狂人日记》遥相呼应的双子星座。吴虞对于孔子思想的批判,为新文化倡导者们扫清前进的荆棘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吴虞的《吃人与礼教》具体论证了鲁迅关于“吃人”与“礼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韩非子》、《汉书》、《史记》、《唐书》等,他以历史上的实例论证以礼教为面纱,吃人的残酷事实。吴虞在文章末尾直接发出呼吁,“孔

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sup>[1]p171</sup> 在《说孝》中,吴虞将《孝经》中部分子女孝敬父母的行为进行批判。例如,为了取悦父母,将不合父母意的妻子赶出家门;为了供养父母,将生下的孩子弄死;为了治愈父母的病,割下自己的肉给父母吃。诸如这样的行为,吴虞认为是不值得赞扬的。这样的孝是愚孝。他认为父母之间不应有卑尊的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相扶助。子女具有独立的人格。父母与子女都是平等的“人”。吴虞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具有石破天惊的影响力。1921年,吴虞在《墨子的劳农主义》中批判儒家将朝廷专制与家庭专制捆绑在一起的阴谋。他认为儒家将君父并尊、忠孝连用,实质是将朝廷专制与家庭专制联系在一起。吴虞赞扬古时的仲子窥破君父并尊、忠孝连用的实质,是用家庭专制来扶助朝廷专制。仲子抛弃世家的富贵荣华,带着妻子自食其力,找寻小家庭的生活。

不仅仅在国内,甚至在海外吴虞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将吴虞1921年写的《墨子的劳农主义》译为日文,发表于日本《支那学》2卷7号。他也将吴虞于1922年写的《荀子之政治论》译为日文,将其改题为《荀子政治思想》,发表于日本《之那学》3卷4号。青木正儿将吴虞思想作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介绍给日本。青木正儿认为,吴虞关于非儒之论比陈独秀还要早。“象这么样,他对于非儒之论,比较陈氏还要先觉一二步呢?”<sup>[1]p479</sup> 青木正儿还认为只有吴虞才是最热心于提倡反孔排儒,也只有吴虞才有想建立老庄思想的人。“现代中国底新人物,都是反对儒教底旧道德的多,但是,象吴氏那么热诚来呼号非儒论的,一个也没有。现在想要破坏旧道德底人们,或奔走于社会主义而思想过激的,实在不少;或要提倡中国固有底墨家学说底人们也不少。这个中间,独吴氏有欲立老庄之道底倾向。”<sup>[1]p482</sup> 这些思想闪现在《吴虞底儒教破坏论》中。范朴斋在介绍吴虞生平的文章《吴又陵先生事略》中,介绍了吴虞在德国的影响。德国图书馆收藏有吴虞的《吴虞文存》。吴虞的《李卓吾别传》被柏林一所大学译为教材。

## 二 悲剧性的落幕

吴虞命运坎坷不平,几起几落,历经几次被驱逐。辛亥革命前一年,吴虞因为家庭纠纷将父亲告上法庭。虽然败诉的是他父亲,但是吴虞却被认为是违背家庭伦理而被驱除出教育界。辛亥革命前夕,吴虞因为宣扬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的思想,清政府下令逮捕他。辛亥革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功。袁世凯夺权后,尊孔复古逆流滚滚而来,吴虞再次遭遇封杀。成都报刊不敢刊登吴虞的文章。吴虞辗转来到北京。《新青年》先后刊登他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主义本于老子说》、《读荀子书后》和《消极革命之老庄》。虞勇猛的批判精神,使得他被置于新文化运动的风口浪尖。吴虞批判儒家的果敢精神与他旧文人的一些习气,又使得他成为新旧两派斗争的牺牲品。1925年,他回到成都任教,依然受到尊孔复古派的打压排挤。吴虞在郁闷中慢慢走完自己的一生。

从1902年、1903年以来,吴虞与朋友一起在成都提倡新学,成绩斐然。1905年吴虞到日本学习法律。在日本的留学经历,让吴虞开阔了眼界、胸襟。面对川内闭塞的局面,他在1919年写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将这一切归罪于儒家。吴虞这样批判儒家思想思想,“我们二千余年都上了他的圈套,还自夸是声明文物礼乐之帮,把那专制时代陈腐的道德死守着,却偏要盲从死动的阻遏那新学说、新道德输入,并且以耳代目,那眼光就在牛市口以上盘旋,全不知道世界潮流、国家现象,近来是什么情况。莫说孔、孟的灵魂,在山东眼睁睁看着日本来占据他桑梓的地方,他的道德和十三经通通没用,止有忍气吞声;就是活起来的孔教会、儒教会的人,又能把旧道德去抵抗日本吗?”<sup>[1]164</sup>为了让川人了解外面的世界,吴虞不仅和朋友王祚堂等办书局报社,而且为了四川以后能人才辈出,他还倡议筹公费派遣人出国留学。吴虞与朋友在川中创设溥利公书局,在成都办《开智阅报》社。吴虞他们办书局报社的行为,引起许多川人的仿效。不到几年时间,书局报社遍布四川。川人逐渐增加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吴虞关于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建议,也得到响应。川中派遣到日本留学的师范生多达三百多人。他曾这样在《王祚堂》中描绘努力提倡新学的效果,“不逾十二年,而风气大通,学校林立,比于古学之兴,迟速悬绝,其于乡邦教育文化,不可谓非原动力也。”<sup>[1]283</sup>然而让吴虞名震一时的不是他在川内提倡新学的行为,而是他对儒家的批判。

在日本的学习过程中,吴虞不仅广泛涉猎欧美

各国的法律,而且了解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他产生了反孔的思想。他认为孔子思想误人子弟,只是空谈礼仪。由这种思想主导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怎能抵挡强权的进攻。他在1906年写的诗歌《中夜不寐偶成八首》中,对孔子予以指责。“英雄欺世惯,圣贤误人深。”、“孔尼空好礼,摩罕独能兵。”<sup>[1]284</sup>1907年,吴虞归国回到四川。因为吴虞著文反对儒教家族制度,批评法律,四川学部赵启霖奉北京学部张之洞之命,取消吴虞讲师的资格。吴虞不仅在事业上遭遇挫折,而且人身自由也被限制。当时的四川总督王人文受到复古派的影响,认为吴虞非圣无法,非孝无亲,淆乱国宪,在全国各省下达对吴虞的逮捕令。吴虞逃到乡下舅舅家才躲过此劫。辛亥革命之后,逮捕令效力自行消逝。吴虞回到成都,在《醒群报》发表文章,坚持反儒排孔的思想。虽然清王朝已经垮台了,倒是尊儒复古的逆流依然汹涌。《醒群报》被查封,直到袁世凯倒台才启封。吴虞在此期间险遭逮捕。当时四川政府保护吴虞,电告北京政府吴虞到日本去了。这才使得他又逃过一劫。后来,虽然袁世凯倒台了,但是成都报刊都不敢再刊登吴虞的文章。吴虞被成都上流社会排斥,依然是“各教罪人”、“士林败类”。吴虞在成都的处境,逼迫他将视角转向川外。吴虞将文章寄往《进步》、《新青年》。正是这样,吴虞开始将他的思想观点带到川外,也将他的影响力带到川外。由于《新青年》在全国的影响力,吴虞的影响力辐射到全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吴虞扮演了先锋激进号的作用。

然而,自古以来,处于风口浪尖的人物往往容易成为悲剧命运者。吴虞也难以逃脱此命运。在成都,吴虞因为反儒排孔曾遭到成都教育界的驱除,在成都几乎无立足之地。他到了北京,这个思想相对开放的城市,他对于儒教的批判使他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这仅从北大学子选吴虞课的人数之多便可窥见一斑。正因如此,吴虞受到保守派的嫉妒。保守派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攻击贬低吴虞。

作为一名过渡时期的文人,吴虞身上难免留有旧时文人的痕迹。在中国,文人与青楼女子交往向来视之为风流但不伤儒雅。吴虞在成都时,就有捧戏子的习惯。他与成都名角陈碧秀等交往密切,也为之写有许多的诗词。例如,1915年他在成都时,曾为吕蕙仙作诗四首,其中第一首便是,“一卷离骚万古悲,潇湘兰蕙慰相思;美人自惜如香草,不是灵

均那得知。”<sup>[2]</sup><sup>[206]</sup>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京期间,吴虞与一位名叫娇寓的风尘女子交往。他投入真诚的情感,为之耗费较多的金钱、时间,并为之写诗赋词。这正为保守派抓住了口实,将诗词加以传播,对吴虞攻击嘲弄诋毁。加之吴虞上课方法欠佳,学生中途退学的较多。诸多原因造成吴虞成为新文化阵营中的一面反面旗子。吴虞与其妻子香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夫妇两人感情深厚,互为知音。当吴虞为成都教育界驱逐、遭遇清政府逮捕时,香祖夫人默默的理解支持着吴虞。当香祖病危时,吴虞每日为之熬药、端茶送水,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夫人香祖病逝以后,吴虞每年祭奠香祖,屡屡在自己的日记中思恋香祖。即使在北京与娇寓等风尘女子交往期间,吴虞也从未曾忘记香祖,常常在日记中对香祖倾述心事。更可况中年丧妻

的吴虞也有权利与异性交往。新旧两派的斗争,吴虞成为攻击的靶子。他与异性的交往为新旧两派不容,成为被批判的口实。他为此深感疲惫,索性待在图书馆进行学术考据。渐渐地,他淡出人们的视线。作为思想界的先锋者,他并没掌握较好的教学艺术,加之,社会对他的各种非议在学生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在北京的教书生涯也不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

尊孔复古派的人身攻击导致吴虞在京的最后日子消极落寞,被排斥在新旧两派文化阵营之外。他于1925年回到成都,先后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吴虞长期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尊孔复古派的排斥打击依然如故。虽然,他后半生在全国的影响力减弱,但是他反儒思想至死没有改变。他的一生有着英雄的传奇,也充满浓厚的悲剧色彩。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赵清,郑城编.吴虞集[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The Tragedy of a Hero

——Wuyu's Rising and Falling Life

PENG Chao<sup>1</sup>, PENG Yan<sup>2</sup>

(1.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2.Ancient Documents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Edit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Dufu Studies, Chengdu, Sichuan 61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Wuyu's several life ups and downs, dialyzes the ups and downs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Wuyu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criticizing and fighting against Confucius. For his criticism of Confucianism, he became the pioneer of the new culture faction and became 'the hero who hits Confucian shop with only one hand'. However, owing to his such thought, he was deported several times in his hometown Chengdu. When he was deserted by his new culture faction, he spent his life lonely.

**Key words:** Criticize and fight against Confucius; Hero; Tragedy

(责任编辑:李 进)